

探寻民国最牛大学，致敬「德学俱隆」的先生们，
呼唤大学精神归来

张守涛 著

先生归来

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



郭秉文

张乃燕

朱家骅

罗家伦

吴有训

陈裕光

吴贻芳

陶行知

吴宓

黄侃

徐悲鸿

竺可桢

胡小石

潘淑

杭立武

魏特琳

吴健雄

王作荣



大学，致敬「德学俱隆」的先生们，
归来

先生归来

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



张守涛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 / 张守涛
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7886-4

I. ①先… II. ①张…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1438 号

书 名 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

著 者 张守涛

责任编辑 孙建兵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86-4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一

民国热大约持续有十多年了，现在还看不到退去的迹象，民国大学热似乎还更有高涨的趋势。这个判断是从出版界的动态中感觉出来的。这些年，凡涉民国历史的读物，多数受到读者欢迎，凡写民国大学的著作，总是热销。我十多年前写的两册相关小书《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学旧踪》，至少有不下三家出版社表示过想重印，前一本，我答应了，后一册，我以为多是简单史料，在今天这样网络便捷的时代，意义似乎不大，一直没有答应。我的朋友智效民先生最早集中研究民国大学校长的历史，他的几本相关著述，也是一版再版。我一向认为自己不是会写文章的人，只是能找点材料和略抒感慨，读者愿意看的可能不是我的文章，而是我寻找到的历史和对历史人物表示出的感情。

对民国的热情，不能简单理解为是怀旧，当然有这方面的情绪。但现在有资格怀念民国的人越来越少，从史料中怀念民国的那些青年人，其实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一种批判，特别是中国当下大学的变化，让他们极端失望，他们要向别处去感受或者呼喊真正大学精神的归来。我个人感觉，中国大学现在的这个样子，不让青年人怀念民国大学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学校长的这种状态，不让青年人仰慕民国大学的校长，也是不可能的。这种热情将会持续很久，因为现状不会改变，青年由失望而绝望，只能把目光投向历史，在怀念从前的心绪中感觉一段美丽的时光……

守涛是不曾谋面的青年朋友，身在南京，更易于感受当年民国大学的历史。他是有心人，以南京这个区域来展示民国大学的风采，这个角度再恰当不过了。南京就是民国，这不仅是意象，也是真实。守涛这本书非常用力，因为他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如果他不在南京，要搜集到如此完备的史料一定



很难；如果他不在南京，要真实感受到民国大学校长的气质也不容易。守涛用自己的感情把南京民国大学的历史呈现出来了，也把民国大学校长的精神传达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走近民国大学的历史，走近民国大学校长。守涛能简洁叙述历史，更能把握大学校长的精神，有历史感受，也有现实情怀，在近年许多写民国大学的书中，守涛这一本既有新史料，也有新角度。

十多年前，我偶然涉足民国大学的历史，当时还没有网络，史料寻找相当不易，所以那时完成的著述多有不足。而今天网络时代，整合史料相对容易，但要在繁杂的史料中觅得独特视角，把这一段历史完整叙述出来，还是有相当难度，守涛这本书完成得很不错。如果说以往研究民国大学校长，多数偏向于北方大学，而守涛这本书一出，南方大学校长的风貌尽现眼前，他们更别有一番精彩。

谢 泳

2014年3月24日于厦门大学文学院

序二

翻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当代中国不少著名大学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晚清时节所掀起的“废科举、办新学”的时代潮流。但在当时“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下,只是移植了西方近代大学有关课程和某些组织形式的这些最早的中国近代大学,还只是初具近现代大学之“形”。直到民国年间,随着“皇帝倒了,辫子剪了”,随着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兴起,也伴同着一批卓越的大学办学者的努力,西方近现代大学精神才得以逐步渗进这些大学,从而使这些大学开始具备了近现代大学之“神”。

南京曾是民国政府的始创地和民国政府的多年首都,植根在这座文化名城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造就这种“形神兼备”的现代大学和推进中国近现代化方面,都曾有过杰出的贡献和卓越的成就。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曾评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南高”——“东大”：“其所成就,亦已丰宏,我国学术界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者,至深至巨。”(严济慈:《南高东大物理系之贡献》,《国风》月刊第7卷(1935年)第2期。)它不仅为中国学术界和事业界培养出“不少特出的人才”,对当时中国的科学进步“起过荦路蓝缕之功”;“在教育理论与方法的革新上,农业的改良,体育的提倡上”,也都“曾开全国风气之新”。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民国那段时期,既是新思潮奔涌激荡,新事物萌芽成长的时期,又曾是交织着战乱和苦难、救亡和革命的时期;因而大学的那种贡献和成就,总是伴同着艰辛卓绝的努力,也往往会更多一份悲壮的色彩。或许正由于此,也使得这些大学的那段办学历史,总会留下许多让人难以忘却的印记。虽然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但它们的那段历史离我们愈久远,反而愈值得我们认真回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张守涛老师所撰《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

人和事》便是一本试图重现那段时期南京的大学的“形”和“神”，帮助我们回味那段大学历史的专著。

该书突破了那种以学校重要事件发生顺序为主要脉络记述大学历史的传统思路，选择了20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南京民国时期大学的校长、教授、学子，分别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描述了他们在民国时期南京高校中各自独特的活动，从而反映出了民国时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办学思想和办学业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民国大学教育的风采和风貌。“文似看山不喜平”，作者以独具匠心的视角、具体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细腻的笔触，通过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使那段时期那些大学的历史活生生地并跌宕起伏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避免了传统校史著述给人的那种平淡无奇、直览无余的感觉，从而增强了著作的可读性。

更难得的是，作者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以真实、全面地反映有关大学的人和事之时，还特别注重深入发掘那些人和事背后的大学精神，如吴有训的“教育独立”精神、吴贻芳的“厚生”精神、吴宓的“殉道”精神、吴健雄的“刻苦求学”精神等。这种发掘，不仅从更丰富的层面上展现了民国时期南京的大学之形态，而且也从更具个性化的角度反映出了民国时期南京的大学之精神。作为读者，也许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对民国时期南京的大学更深刻、更强烈的感知，也可以从中获得对今天大学办学或自身治学有益的启迪。

作者是南京大学校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曾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因而这本书的写作，无疑凝聚着一种对母校的深厚情结。这种情结，从更普遍和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大学情结，一种以大学为精神家园的情结；而大学的精神力量归根到底在于知识和真理的力量。“在研究和追求真与美的领域里，我们可以永葆赤子之心。”期待作者坚守这份情结，更上一层楼，再续新的佳作！

冒 荣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言

谁是民国时期最牛的大学？不是清华、北大，也不是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而是中央大学。论师资队伍，它是当时部聘教授最多的大学，教师数量是同期西南联大的一倍多；论学科建设，它系科设置最为齐全，是整个民国时期唯一一所全部拥有《大学组织法》规定的八个学院的大学；论培养人才，它的学生最多，且曾在1940年全国大专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中，获得甲乙丙三组总分第一；论国际排名，它在1948年普林斯顿大学评比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亚洲第一，并挤入世界大学前五十名。这应该还是中国大陆大学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最靠前的排名。

为什么中央大学这么牛？不可否认，这首先要归功于它的“中央”二字。作为民国首都南京的龙头学校，国民政府对它的重视、支持都是其他高校不能相比的，蒋介石甚至亲任过它的校长。但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也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中央大学为此就得成为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重要基地。

无论利弊，因为身居南京，中央大学及其他南京高校为此具有独特风貌、特点和意义。一、南京地区的民国大学教育资源丰富，受到重视和支持，因而教育成绩显著，取得众多全国第一，如中央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是全国最早最有名的实验学校、金陵大学是民国最好的教会大学、金陵女大是民国最好的女子学院、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高等药学学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是国民政府设置最早的军事教育机构、金陵神学院是中国基督教的全国性神学院、海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海军的缩影；二、南京是民国政治中心，因而南京民国大学教育受政治影响较大，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中央大学是大学区制的重要实验场所，中央大学校长更替频繁且学潮频发；三、南京民国大学还具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如以东

南大学“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倾向、中央大学“诚朴雄伟”的学风、金陵大学的教会特色、晓庄学校的乡土特色，以及受国民党控制较大而具有的政治意义上的保守色彩。

但南京这一地理位置的影响只是外在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等南京高校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最主要还在于内因。首先便是校长的功劳。校长是一所大学的“领头羊”，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可以说“校长强，则学校强；校长衰，则学校衰”。以中央大学为例，如果没有“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的奠基，没有罗家伦十年的“安定、充实、发展”，没有吴有训的提升，就绝不会有中央大学的牛气。掌学校二十余年的陈裕光、吴贻芳对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的贡献更是居功至伟，可以说，完全是他们一手把学校“养大”的。其次，在于师资的优良。诚如“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师资乃是学校发展的命脉。中央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最高学府，最主要就在于它的师资最多最为优秀，如郭秉文曾将“中国科学社”的核心成员都请到学校，中央大学理学院仅1933年就聘了十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再者，学风的影响对一所高校也至关重要，可以称得上是学校的“灵魂”，如中央大学的“诚朴雄伟”校风、金陵女大“厚生”精神、晓庄师范学院“生活教育”理论都是这些学校取得独特成就的重要原因。最后，不得不提的还有“教育独立”，即遵循教育规律办学，尽量减少政治干预，教授治校，学生治学。中央大学虽备受国民政府宠爱，但无论是蒋介石爱将罗家伦还是著名学者吴有训都非常强调“教育独立”，非常尊重师生，尽量将“国民党”挡在门外。金陵大学、金陵女大虽是教会大学，但也都特别注意教育独立，尽量去掉教会色彩。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等南京民国大学的辉煌成就却多被“忽视”，国内外相关研究并不太多。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述评了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陈裕光、吴贻芳、陶行知等十位南京民国大学校长，主要介绍其教育经历、成就、思想，试图挖掘他们如何办好大学的经验，以供今人借鉴。此外，师生是学校的主体，本书也“刻画”了十位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各具特点的师生，以此反映南京民国大学的整体风采。必须说

明的是,本书还试图略窥民国时期大学的总体风貌,因此在书中打了许多“补丁”。这点苦心,还望读者明察。

虽然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都已成为历史云烟,但它们的贡献无法抹掉,其教育价值更是永垂不朽,值得我们走近、了解、学习,如北大陈平原教授所言:“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不可能单靠单纯的横向移植,是否理解并尊重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将是成败关键。”如能配备杰出校长和优秀师资,拥有良好学风,遵循教育规律,我们今日的大学再创辉煌也并非难事。

目 录

郭秉文：“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001
张乃燕：中央大学首任校长	/019
朱家骅：辞了中大校长，升了教育部部长	/038
罗家伦：清华大学奠基者、中央大学振兴者	/054
蒋介石：亲任中央大学校长	/076
汪精卫：伪中央大学及奴化教育	/089
吴有训：不愿当校长的校长	/099
陈裕光：教会大学首位华人校长	/113
吴贻芳：中国最杰出的大学女校长	/131
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45
吴 宓：“世弃方知真理贵，情多独叹此生休”	/158

黄 侃:亦狂亦庄亦文亦武	/175
徐悲鸿:奋力奔腾的“骏马”	/189
竺可桢:从东大教授到浙大“保姆”	/202
胡小石:传统文人现代范	/216
潘 菽:“红色教授”六十年	/229
杭立武:右派教授报国路	/244
魏特琳:“菩萨”外教中国心	/257
吴健雄:“中国居里夫人”大学时	/272
王作荣:“同学少年皆不贱”	/284
主要参考文献	/294
后记	/298



郭秉文 “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我们今天，提起民国大学教育之创始之辉煌，多提蔡元培和北大，而少知或不知郭秉文和东南大学，这实在是“很傻很天真”很不该。“东南大学当时为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与北大南北对峙，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近代史学者梁和钧如此评价道。他的话后面还有一句，即“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美国著名教育家、时任世界教育联合会东方部主任孟禄博士在 1921 年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盛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这“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的奠基人和 CEO 便是郭秉文，他是中国第一部教育制度史的作者，是第一位获得留美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也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连续三届被推选为世界教育联合会副会长的中国教育家；他还是大学生“男女同校”教育的先行者，是美国大学模式的引进者，也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牺牲者。

1908 年，已经工作十二年、即将“三十而立”的郭秉文毅然辞职，远涉重洋，赴美留学。他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号称“世界新教育中心”，实验主义教育大师杜威、著名教育家孟禄等一批名流学者在该学院任教^①。

在校期间，郭秉文曾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其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被誉为中国教育制度史的开山之作，“是一部中国教育制度简史，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他随之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郭秉文在美国的求学经历以及对中国教育的扎实研究，无疑为他日后走上教育之路和取得辉煌办学成就奠定了基础，他在博士论文中曾写道：“教育之改良为一轴，牵动各种事业皆随之而变新，教育造成人才为国家之栋梁，措国家于磐石之安，故曰，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业。”

广延名师

就在郭秉文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博士论文时，收到了正在筹建之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的聘书，邀请他做教务主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始建于 1902 年的三江师范学堂，1905 年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后因辛亥革命战火，学校停办，1914 年 8 月，耆德硕儒江谦受命筹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江谦上任后的第一着棋便是聘请郭秉文为教务主任，并请他代为南高师延揽师资。1918 年 3 月 21 日，江谦因病休养，由郭秉文代理校长。次年 9 月 1 日，教育部正式委

任郭秉文为校长。

郭秉文没有辜负江谦的厚望，深谙办学之道首在广延名师。他往往先拟定优秀中国留学生名单，请欧美著名大学校方代为考察，然后再与之交谈，甚至亲往旁听教学或观察实验。对于真才实学者，郭秉文常常预付薪金，以作归国“旅费”。曾在东南大学教科任教的程其保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时，便收到郭秉文的电报，请他担任执行秘书兼教育学教授。程其保正高兴得准备回复，又收到郭秉文第二封电报，说他即将来美出席世界教育会议，约程见面，并请程担任会议代表之一，“当时我尚学生之一，获此殊荣，侪辈均为我合。我自幼立志教育，有此开端，更启示我今后事业的途径，为我对鸿声（郭秉文字鸿声）先生一生都难以忘怀者”。^②更被传为美谈的是郭秉文将中国科学社“打包”迁了回来，成为学校师资来源的“金矿”。中国科学社^③为当时在美国的一批留学生精英创建，郭秉文先聘请社长任鸿隽和主要发起人秉志、胡刚复、杨杏佛来校，或委以重任，或待若上宾，并鼎力支持他们将中国科学社大本营安营扎寨在南高师，南高师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大本营”、“中国自然科学的发祥地”^④。科学社其他留学生也随之“孔雀东南飞”源源而来，连胡适都曾在致郭秉文的信中遗憾道：“如果不是蔡子民（元培）先生和我早已有约在先，我一定会到南高师执教。因为，早已有好些位和我一同留学的同窗好友，如任鸿隽、陈横哲、梅光迪等，都已经被您拉到南高师了。”

一时间，东南大学名师荟萃，俊彦如云，“东南所延教授，皆一时之选”，学人也皆以受聘南高师、东大为荣。郭秉文在任期内聘任的著名教授有陈衡哲（中国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柳诒徵、蒋维乔、陈中凡、吴梅、吴宓、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任鸿隽、竺可桢、熊庆来、陶行知、陈鹤琴、李叔同、邹秉文、茅以升、杨杏佛、马寅初等五十余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羡慕嫉妒恨”道：“郭秉文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⑤

据二十世纪国立东南大学教员履历统计，在二百二十二名教员中，留学出身者有一百四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四以上，其中理工科教员几乎全是“海

归”。这些“海归”为南高师、东南大学的迅速崛起和中国教育、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熊庆来创建东大数学系、秉志创办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茅以升扩展工科、胡刚复引进物理学。北伐胜利后，北平几所著名大学争相来东南大学聘请科学教授。叶企孙、吴有训、熊庆来、张子高等人都由东大转往清华执教或毕业后受聘于清华，创建清华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系。中国科学社更是成为中国科学的“孵化器”和“发动机”，孕育了许多专业科学团体，如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都与中国科学社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这些教授均较年轻，一般在三十岁左右。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多仍在大专院校、学术研究机构任职，并多成为中坚力量，如中科院三位主管业务的副院长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皆是东大师生。

首开“女禁”

郭秉文主政南高师后的第二个创举是开“女禁”，首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外，大都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教育史上称此现象为“女禁”。1910年春，当时的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和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同车赶往上海，一路闲谈，忽生感慨，感慨中学毕业女生升学的机会太少。于是，南北两所最高学府校长相互期勉，决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

消息传出后，朝野哗然，反对声滔滔不绝，江苏省议会非议责难声夹杂着诋毁、谩骂漫天袭来，就连思想比较开明的张謇和老校长江谦也明确反对。江谦断言，如果实行男女同学，不出一两年定出大乱子；张謇等则警告南高师“不要轻举妄动”。一时间，此消息甚至导致社会恐慌，许多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被深锁闺阁足不出户。人们当时仍然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中学及其以上阶段的教育机构中，女子不得与男子同校受教，更不能越“大学”这个雷池一步。对此反对声潮，时任南高师教务主任的陶行知反驳道：“男女工人可以同做工，男女农民可以同耕作，为何男女学生不可以同学习？难道读

书人的道德水准比资本家、工人还低吗？”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多方努力协调疏通，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

北大在1920年2、3月招收女子旁听生九名，其中七人于该年10月通过考试转为正式学生，而南高师在1920年暑期一下子便招收了五十名女生，9月入学后，则正式招收了八名女生、五十多位旁听生。因此，北大和南高同时在中国首开女禁，甚至可以说是“南高在中国首开女禁”。当时的女生们，对同时招收女生的南高、北大也有比较、选择。有一位叫张佩英的女生，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鼓动下，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投考。据她回忆，她曾在北大和南高师之间多次权衡，终嫌“北大官僚气太浓”而选择了“学风深厚”的南高师，并认为能成为南高师首开“女禁”的“受惠者”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男女生同堂听课，一起活动，使校园里平添许多生气和乐趣。学校当时专门设立了女生指导员，八位女生在校行动均要受指导员监督管理。女生宿舍还配备了“女舍监”，确保“所有女生须于下午七点半之前返校”，“夜后女生不能游行”。女生可在宿舍楼的公共会客室里会见来访客人，但每晚不能超过七点半钟，会客时不得关闭门窗。也常有女生在会客时把门窗关闭得严严实实，女舍监竟喊来工友把门窗统统卸了下来。南高师还规定，男生不得进入女生宿舍，而“女生不论何事，不能入男生宿舍，或宿舍四周”。但青春无敌，男女之情不可阻挡，男生纷纷拉拢女生进社团任职，并利用社团事务、班级活动、野炊郊游等借口接近女生。而女生收到鲜花、礼物时，也都大大方方地摆到桌面上。校园风气因此有了很大转变。从前不修边幅的男生，现在“焕然一新”，言行举止也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得多了。为获得女生青睐，男生们也更发奋读书，或更积极参加社团活动。

开放“女禁”影响甚大，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到第二年秋，南高师各系已有女生三十余人，获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美国克兰公使夫人等人赞赏。熊希龄赞道“男女同校，令粗犷之男生，渐次文质彬彬；令文弱之女生，渐呈阳刚之气，颇有意义”，克兰夫人还特捐银四千元资助女生就学。南京大学60周年校庆时，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